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
2000年12月，頁121~149

BIBLID1012-8514(2000)26p.121~149

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係

1926~1950

王晴佳*

提　要

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遷。這些變遷的結果是，中國史家不斷分化組合，以意識型態和治史風格為分野，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大致說來，在二十世紀上半期，至少存在三大派別：科學史學派、傳統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如果依治史的方法來看，又可分「史料」與「史觀」兩派。由於各種條件的變化，這些流派之間又不斷交叉融合、相互影響。本文以錢穆早期史學為例，探究錢穆與科學史學家，即「史料學派」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錢穆的早期學術生涯，受到科學史學家的影響，以「考史」成名。但由於抗戰的關係，則使他逐漸與科學史學分道揚鑣，改以「著史」為業，宣揚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使他以後成為一代「國史大師」。

關鍵詞：錢穆　科學史學　胡適　顧頡剛　傅斯年

* 作者係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二、科學史學的興起及其演變
三、錢穆與科學史學
四、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
五、結論

一、引言

有關錢穆先生的學術定位問題，特別是有關他與新儒家之間的關係，在他逝世以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1]但不管錢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響他作為現代中國一代學問宗師的地位。事實上，這些討論本身已經表明，雖然錢先生以史學成名，但他學問之淹博，已經使他的治學超越了史學的範圍而成為所謂「國學大師」，以致在他逝世之際，他的弟子逯耀東如此感嘆：「絕了，絕了，四部之學從此絕了！」[2]在錢先生逝世十週年之際，由臺灣大學中文系主持召開錢穆學術生涯的綜合討論

1 有關這些討論可見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30~90；以及錢穆妻子胡美琦，〈讀劉著《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驗內省》一文有感〉，《中國文化》第十三期（1996 年 6 月，北京），8~19。中國大陸的學者，通常把錢穆與其他新儒家並列，如胡偉希，《傳統與人文：對港台新儒家的考察》（北京：中華書局，1992）；方克立、鄭家棟主編，《現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2 將錢穆先生稱為「國學大師」的作法，在大陸學者中頗為流行。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國學大師叢書」中，錢先生的傳略就被列為一種。在所謂的「國學大師」中，自有高下之分。該叢書中有些傳主之「大師」稱呼，就頗有些商榷的必要。但錢先生的地位，則無可懷疑。錢仲聯紀念錢穆的論文，將錢穆與王國維並列，便是一例。見氏著，〈紀念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7~79。逯耀東的評語見氏撰，〈夫子百年：錢穆與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承〉，收入李振聲編，《錢穆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恰好反映了錢穆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和影響深遠。

但錢穆先生首先而且畢竟是一位歷史學家。史學研究不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礎，也是他治學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錢穆的論著中，不少人都稱贊他「以史證經」、「以史證子」的成功。[3]那麼，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錢穆的史學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呢？這是本文希求探討的主要問題。要想解答這一問題，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將錢穆的史學置於現代中國史學的演變過程中考察，方能對他的史學成就，有一種比較清楚的認識。如所周知，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其史學研究的傳統受到了激烈的挑戰，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這一改造的結果是，各式各樣的「新史學」層出不窮，使得史學界出現流派紛陳、相互競爭、遞嬗的複雜局面。在中國史學史上，二十世紀可以稱得上是史學界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錢穆先生置身於內，參與其間，其成就及影響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論學不立門戶」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學研究有別於一些常見的流派。[4]因此，對錢穆史學的研究，就顯得別有興味。

二、科學史學的興起及其演變

為了正確闡述錢穆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我們似乎必須對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作一簡述。中國史學的革新與改造，自然是與西方強權的侵入是有關係的。在鴉片戰爭的時期及其以後，中國的有識之士便覺察到認識外部世界的必要。從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到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努力，其結果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具體而言，這一影響體現在兩個方

3 參見李木妙等人對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評論，見李木妙編撰，《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臺北：揚智文化，1995），120~127。

4 在余英時回憶、討論錢穆學術的論著中，他一再強調錢穆信奉章學誠「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來證明錢穆學問之博採眾長。參見余著，〈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中國文化》，30~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第一是中國人眼界的擴大。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就將一般人對世界的認識，從沿海的鄰邦擴展到了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但從第二個方面來看，這一「開眼看世界」的結果，反而縮小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從原來的「天下」縮小到了「國家」。中國人漸漸拋棄了以前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而將注意力慢慢轉移到了國家，也即中國與外國，特別是與西方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但在這一新的國家觀中，又包含了原來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此有較清楚的分析。他認為在清末的知識分子中間，這一國家觀常常有不同的含義，取決於人們對清王朝的態度。[5]保皇派可以將清王朝等同於國家，保國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則將國家界定為中華民族的天下，清朝的滅亡正好是保國的必要條件。但無論如何，國家的興亡已經成為中國人注意的中心。從天下到國家，反映的是中國人的認同觀念所產生的深刻變化。

這一認同感的變化與國家觀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導致了民族主義史學的勃興。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和1905年開始《國粹學報》上有關史學的論文，都代表了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如果說在十九世紀末年魏源、王韜等人介紹西方的著作中，中國人對西方的知識只是原來的天下觀念的延伸，那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於國家觀念的普及，原來的中國為天下之中心的觀念已經被中西之間的抗衡、甚至中國應模仿西方的認識所取代。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他一方面將高揚民族主義視為史學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史學為樣板，批判中國的傳統史學。由此，中國史學開始「革命」，進入了一個全面革新的階段。在梁啟超看來，雖然中國史學汗牛充棟，但並沒有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產生多少幫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正史」，只是專制帝王的家譜，未能記載多少中國民眾的事跡，即所謂中國的「舊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顯而易見，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想將「國家」作為史學著述的中心。

5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近代中國像的再檢討〉，收入《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5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樣的企圖也見於「國粹學派」的著作中。所謂「國粹」、「國魂」，都首先由日本學者所發明使用。「國粹學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與梁啟超一樣，曾受到日本現代學術的影響。在「國粹學派」追尋中國這一國家的起源及其特質（即「國粹」）時，歷史學也是他們重要的工具之一。從建設民族－國家的需要來衡量，「國粹學派」的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史學，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鄧實就寫道：

> 悲夫，中國之無史也。非無史，無史材也。非無史材，無史志也。非無史志，無史器也。非無史器，無史情也。非無史情，無史名也。非無史名，無史祖也。嗚呼，無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則無史矣。無史則無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6]

鄧實像梁啟超一樣，以民族主義史學為基準來檢驗中國傳統史學，由此而發展中國「無史」的嗚呼。更有甚者，他認為沒有史，便沒有學，而沒有學就沒有國，於是將史學研究，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這種以國家觀念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史學，是勾勒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脈絡。以後史壇流派紛陳，但都不脫此藩籬。錢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史學的興起和演變時，也將錢穆的史學放在其中一併考慮。[7]

從天下到國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中國人世界觀的巨大變化。一旦放棄了中國作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的一個成員，就自然需要對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慮。這是當時民族主義史學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其實，就當時中國所處的情形來看，這一問題似乎十分簡單明瞭，那就是在西方強勁的挑戰面前，中國顯得軟弱無力、雄風不再。於是，許多開明、激進人士提倡改革、變法，以求中國之重振。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其實卻反映了一種歷史觀的深刻變化，即那時的中國人開始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考察歷史的發展了。因為正是通過進化論，人們才開始將世界各地區的歷史放在

---

6 鄧實，〈國學微論〉，《國粹學報》第 2 期（1905，上海）143~144。

7 見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China," Erik Lönnroth, Kari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155~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庫

一個起點上考察，以觀察它們前進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於進化論，即通過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歷史的比較，人們才注意到古代中國的先進和現代中國的落後，於是就有了所謂「復興」的提法。「國粹學派」對「古學復興」情有獨鍾，而五四時期的人物則提倡「文藝復興」，都是顯例。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當時的思想界自然有震聾發聵的作用，但進化論的一般道理（國家之間的孰先孰後），對於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並不難理解。[8]正是由於進化論的觀念顯得如此顯而易見、深入人心，康有為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到儒學經典中尋找其痕跡，以求證明在中國古代學問（三世說）中，也包含有這一「偉大的」真理。

由於進化論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學在中國便顯得十分必要。因為要想復興中國，就不得不回過頭去，看一看古代中國的先進，具體表現在何處，又如何能對當前復興中國的任務，提供何種幫助。於是，歷史研究就帶上了「目的論」(teleology)的眼光，即如何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能服務於當代的史實，提出新的歷史解釋。這一用「目的論」的眼光考察過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區民族史學中，都有明顯的表現。[9]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實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國的民族史學，呈現特別活躍的局面。如「國粹學派」對中國民族歷史的構造，就力圖從遠古的時代入手，發現一些與現代科學相契合的因素，而將這些「現代因素」的湮沒不彰，歸罪於儒學的興盛。[10]毋庸贅言，「國粹

8 吳展良在其《中國現代學人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論集》（臺北：五南圖書，2000）中指出，嚴復之翻譯《天演論》，有其求道之宏旨，這是就嚴復個人的學術生涯而言。從《天演論》的影響來看，它當時之所以風靡一時，則是由於它對中國人如何求「富強」，提供了一個方案。事實上，當時中國人所求的是中國的「再度富強」。這裡的進化論觀念，十分明白。

9 有關民族史學的研究論著很多，前舉余英時參加寫作的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一書，就是一例。另可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0)，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民族史學，也做了一些分析。

10 如鄧實就在〈國學原論〉一文中指出，在古代中國有所謂「鬼神學派」與「術數學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派」的復興古學的目的，是為了建設一個強盛的現代中國。這種出自現代的關懷而回顧、「發現」過去的作法，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標誌。

同樣為了「發現」過去、復興古學，其作法可以多種多樣，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史學流派。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悠久的學術傳統中，對古代經典自有一個不斷革新、變化的詮釋傳統。[11]現代學者之復興古學，就不可避免地會與之相聯繫。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期推崇今文經學、貶斥古文經學，便是現代學者從現代的立場「託古改制」，並與已有的詮釋傳統相結合的一個例子。

康有為之倡導今文經學，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但他對所謂「新學偽經」的指責，則為二十世紀初年的學術界的「疑古」風氣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並不能將這一「疑古」的風氣，完全歸咎於康有為。事實上，由於進化論的影響，當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從現代中國的問題出發，已經對現存的文化傳統，逐漸產生種種惡感，視之為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他們的著眼點，是將科學理性的發達視為西方文化強盛的基礎，而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傳統中把科學研究視為「末技」的作法，視為現代中國貧弱的主因。如果說進化論讓當時的中國人認識到自身的落後，那麼科學主義則向他們揭示了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國現代史學的改造必須仰賴科學方法，從梁啟超的《新史學》以來，成為不少人堅守不移的信仰。

用科學方法復興古學、重振中國，梁啟超首開其例。科學史學對寫作《新史學》時候的梁啟超而言，就是如何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因此他在《新史學》中，將展示歷史的進化視為

前者研究自然界的變化，後者探究科學。但這些學派在秦漢以後，則由於儒學的興起而衰微。見《國粹學報》第1期，21~31。

11 由黃俊傑在臺大主持的「中國經典的詮釋傳統」的研究計劃，已經對這一詮釋學的傳統做了不少探究。除了已經出版的中文著作以外，尚有涂經怡(Ching-i Tu)主編的英文文集，*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研究的宗旨。但是對小他一輩的胡適來說，進化論則應該是一種科學方法。胡適對此有一段重要的解釋：

> 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所用的「進化」觀念仍舊是海智爾（Hegel，通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12]

一旦進化論成了一種歷史方法，它就對復興古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康有為對「新學偽經」的懷疑，如果用胡適的話來說，只是一種「大膽的假設」，缺乏詳實的證據。而「進化」的方法，或「歷史的態度」，則為如何證明這種懷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偽書、偽經的來龍去脈，用事實來證明其偽。由此看來，在胡適1917年回國以後，學術界的「疑古」風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提出懷疑到證實其懷疑。但是雖然胡適將進化論解釋成一種方法，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用進化論史觀看待中國歷史的演化。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好證明中國傳統學術中科學精神的不足。因此，進化論史觀所揭示的中國的落後，仍然是胡適等人「科學實驗」的思想背景。

既然缺乏科學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那麼胡適所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就必然以尋求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態度為主要目的。但是像「國粹學派」一樣，胡適也有復興古學的願望。雖然他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實際上他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先進，仍然抱有信心，認為不會與科學的精神相差太遠。胡適在美國攻讀博士時以先

12 胡適，〈實驗主義〉，《問題與主義》，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臺北：遠東圖書，1990），2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秦哲學為研究對象，表明他像鄧實等人一樣相信，在遠古的時代，中國文化中包含有科學的因素。的確，在他博士論文的起始，他就斷言中國和西方的哲學中，都有邏輯方法存在和發展的例證。[13]從胡適的這一立場來看，他把清代考證學家的方法視為科學方法的一種，也就不足為怪了。換言之，胡適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想通過這一「整理」，發現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科學精神，加以重振、復興，以求富強。胡適將他所參與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稱為「文藝復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心態。

但既然有復興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適看來，中國的文化在過去的某個時期，存在著不足，與科學的精神相背離了，因此有待現代中國人的重振。這一問題出在哪兒呢？胡適對當時中國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會的、倫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點還是學術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雖然有科學的精神，但長期以來並未有長足的進展，於是許多文獻資料就顯得很不可靠。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華。受到胡適的影響，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辨」的討論。顧的大膽「疑古」，繼承了康有為、廖平等人懷疑古文經學的傳統，是那個時代「疑古」風氣的一個集中表現。[14]但是，顧頡剛的「疑古」，雖然像康有為一樣態度激烈，但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還是胡適。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證明。[15]既然顧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胡適，那麼他的「疑古」就必然帶有求證的意圖，即如何用事實來證明作偽的經過。如此一來，這一「疑古」就帶有建設性的意向。顧頡剛本人也聲明，他的「疑古」，是為了在科學的基礎上重建古

13 胡適，《先秦名學史》，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770。

14 顧頡剛曾說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討論百餘年後該作的工作」。這說明他有受到康有為等人的影響。《古史辨》（香港：太平書局，1962），第2冊，〈自序〉，6。

15 顧頡剛的自述見他的《古史辨》第1冊，〈自序〉，1~103。對顧頡剛疑古思想淵源的考察，可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1987）和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臺北：商鼎文化，1993）的有關章節。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

史。[16]易言之，顧頡剛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於他「疑古」成名之後，為聲名所累，又由於戰爭與革命的影響，使他無法全力從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過，顧頡剛雖然自己無法全力以赴，但對別人用科學考證的方法重建古史，還是盡一切可能提供幫助和支持。因此，顧頡剛之提拔、推薦錢穆，並非偶然，而是他在學術界的一貫作法，也是他學術理念的一種反映。[17]

三、錢穆與科學史學

對顧頡剛提拔錢穆一事，一般人都歸之於顧在學術上的寬宏。[18]這固然沒有大錯，但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顧之推薦錢，也是因為錢穆的治史，與顧在當時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處。如上所述，顧頡剛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辨」論戰，就其對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來看，是為科學史學、批判史學開闢了道路。胡適在評論「古史辨」的討論時已經指出，不管雙方意見如何，但都必須用同一種方法：「就是尋求證據」。[19]由此看來，「古史辨」的討論，與其說是批判傳

16 顧頡剛在清華講授中國古代史時，表示了用科學方法重建古史的意向。見他為《古史辨》第3冊和第4冊寫的自序。他也認為考古的方法會幫助人們最終達到這一目的。見氏著，〈中國古代史述略〉，《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474~478。

17 在顧頡剛女兒顧潮寫的《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顧頡剛提拔別人的事情。據顧頡剛自述，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北京，學術界有三大「老板」：胡（適）老板，傅（斯年）老板和顧（頡剛）老板。但前兩位都有研究所或基金會作後盾，而他自己則靠自己的薪金支持青年學者。179~180。

18 持這種觀點的人中包括上引顧潮的《歷劫終教志不灰》，138~139。錢的弟子嚴耕望的〈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中也說顧的「胸懷實極難得」。見《錢穆印象》，8。美國的Jerry Dennerline也把錢穆視為顧頡剛的「對頭」(opponent)。見氏著，*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19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第1冊，190。彭明輝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藏

統，不如說是為現代史學研究標準的建立奠定基礎。現代中國史學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種學術規範，即以批判史料、考證史實為圭臬。[20]錢穆之為顧頡剛賞識，正是由於錢的早期史學著作符合當時史學研究的規範。

如所周知，錢穆由於早年喪父，未能上大學深造，而是在無錫、蘇州附近的小學與中學各教了十年書。由於江南一帶文風的燻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學，錢在教書期間，閱讀了大量典籍，積累了豐厚的經史方面的知識。從他自學的情況來看，他的早期興趣以研讀、詮釋經典為主，與傳統的學者相近。錢最初的兩部著作，《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時的治學興趣。

但是，青年時代的錢穆，雖然以教書為業，但卻沒有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願望。錢在十九歲時，得知北京大學招生需章學誠《文史通義》和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兩書，便購來勤讀。這說明他有應考的想法。既有應考的想法，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學術界的情形，也一定關心。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道，他在那個時期逐月讀北京的《新青年》雜誌，就是他關心學術界新動向的一個證據。[21]既然關心學術界的動向，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文史界的風雲人物如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和以後的顧頡剛，都一定很瞭解。對於他們的學問興趣，也多知曉。事實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錢穆還效仿梁啟超而自學日文，就說明他還沒有放棄升學，或者進入學術界的願望。雖然錢穆在晚年回憶時，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多有批評，但不難想像在青年時代，他還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隨他們的想法的。當然，這裡的所謂「追隨」，並不指錢穆同意

國史學的發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中也指出，「古史辨」論戰的雙方都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71。

20 拙文，〈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對此有較詳細的論述。《中華文史論叢》第6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3。另見拙文，"Historical Writings in 20th China: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Rolf Torstendahl ed., *An Assessment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Stockholm: 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2000), 43~69。

2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1983），79~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胡適、梁啟超對傳統學術的批評，而是指他那時對這些人的治學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錢穆當時在中學講授「國學概論」，並寫成和以後出版的《國學概論》一書，對我們瞭解他當時的治學興趣，有很大幫助。應該說，在二十年代後半期，也即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錢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學講授「國學」，就已經表示出在那個時代，學術界與教育界已經接受了那種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國家為關懷的中心的文化理念。當然，錢穆雖然教授「國學」，但他對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國學概論》出版時他在「弁言」中寫道：

>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22]

這一段話，十分有意思。其中「學術本無國界」一語，表明錢穆仍然像傳統儒家那樣，沒有忘懷天下。但他在同時又說他應時代之需，採用了梁啟超的觀點，表明錢穆在那時也願意跟隨該時代的學術潮流。

在《國學概論》書內，更有不少例子說明錢穆對「新」學問，非常了解。這一了解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錢穆在書的最後一章中，對「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做了較詳細的介紹。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時參考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人的著作，與前人的論述作比較。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幾個例子。譬如，在錢穆那時下力很深的先秦諸子研究中，他就參考而且同意胡適的意見，認為「諸子出於王官論」的說法不可靠：「遑論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之說哉？故謂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可也，謂諸子之學一一出於王官則不可也」。[23]在談到兩漢今文、古文的爭論時，錢穆像顧頡剛一樣，並不認為在漢代，有所謂今、古文之爭。

---

22 錢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1。

23 錢穆，《國學概論》，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術時，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討論的藩籬。[24]到了唐代，有關佛經的翻譯，錢穆則引用了梁啟超的論著。[25]在講述清代考據學時，錢更是大段引用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他對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總結清代考據學時，錢穆引用了胡適、梁啟超的意見，認為這些考證的手段，代表了科學的精神，有助於史學的研究。不過，錢穆對清代學問還是有所保留。他引證了柳詒徵對之的批評。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歡胡適的批評。錢穆引了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說法，認為清代考證學，欠缺對「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從錢穆以後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不滿做純粹的考證學問，而是有意成為一名「史家」的。[26]看來胡適對早期的錢穆，也有一定的啟發。

錢穆對他同代學者的直接評論，見於《國學概論》的最末一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在該章中，他將章太炎、胡適和梁啟超視為當時治先秦諸經與諸子的主要人物。對於胡適，更是贊譽有加。認為他「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27]這幾乎是「夫子自道」，即錢穆已經認識到，在那個時代即使做古代的學問，也須採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後的論著中，不斷將中西學問做比較，看來與此認識有關。事實上，在寫作《國學概論》時，錢穆已經對西方的一些學術經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28]

當然，錢穆對胡適還是有批評的。他提到胡在寫作時，由於匆忙而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顯得潦草。但他馬上又說：「要之其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

24 錢穆，《國學概論》第4章，80~121。顧頡剛對今、古文經的態度主要見於他〈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入《古史辨》第5冊。

25 錢穆，《國學概論》，173~174。

26 錢穆，《國學概論》第9章，246~317。

27 錢穆，《國學概論》，323。

28 錢穆，《國學概論》，61。其中錢穆談到古代的柏拉圖和現代的克魯泡特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矣」。甚至在將胡適與梁啟超比較時，錢穆仍然偏好胡適。他說雖然梁的著作「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更為重要的是，錢穆對來自東南大學柳詒徵的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轉風氣之功。[29]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說那時的錢穆對「新學問」有仰慕之心、追隨之意，恐不為過。而他那時對胡適等人的反動派，則並不見的有多少同情。

譬如，錢穆在評論柳詒徵在東南大學的同事吳宓、梅光迪等人的《學衡》雜誌時，這樣說道：這些人「隱然與北大胡、陳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運動為對抗。然議論蕪雜，旗鼓殊不相稱」。在簡述了「學衡派」的「人文主義」以後，錢穆也只是說：「蓋與前引二梁之書（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桴鼓，皆對於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學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矯正西洋思想，與二梁以中西分說者又微不同」。[30]從這些不溫不熱的評語可見，錢穆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者，並不看好。而他所認為與新文化運動可以相媲美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一認識到了以後也沒有改變。[31]

錢穆在《國學概論》中的這些意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進入學術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為雖然《國學概論》出版於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學任教以後，但據他自述，他寫作該講義，是在1926和1928年之間，也即在他結識顧頡剛以前。[32]該書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對當時學術界的先進所抱的比較真實的看法。從上述的討論來看，錢穆在那時對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人對傳統的懷疑與批判，並無惡感，而對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頗為贊許。因此，他在1929年認識顧頡剛以後，會馬上被後者所欣賞，並非完全偶然。事實上，錢穆

29 錢穆，《國學概論》，324~325。

30 錢穆，《國學概論》，347~349。

31 錢穆不僅在《國學概論》的末尾闡述三民主義的偉大，也在以後其它的著作中做相同的論述，如《國史大綱》等書。

32 見錢穆，《國學概論》，〈弁言〉，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國學概論》中，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頗為稱許，認為他們「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並對他們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適所謂的「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剝皮主義」，表示有「注意之價值」。[33]

既然錢穆欣賞胡適、顧頡剛，那麼他那時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適等人所創建的學術標準靠攏，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錢穆早期的兩部成名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治學與胡適、顧頡剛等人「互補」的情形。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錢之寫作該長文，是在寫《先秦諸子繫年》之後，以應顧頡剛的稿約。從他的寫作宗旨來看，有不少與顧頡剛對古史的態度相契合。而錢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他認為有「價值的」、胡適的「剝皮主義」。[34]像顧頡剛、胡適等人一樣，錢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壘，對古書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不明顯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希圖用考證的方法，將古書的真偽作細致的研究。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錢穆對古典學問始終抱有一種崇敬的態度，不願輕易將之摒棄，而胡適、顧頡剛則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對傳統學術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不過，在錢穆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時，他並沒有全面闡述他的學術觀點。此時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著史」。這是他在那時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科學史家」所欣賞的主要原因。在錢穆到北京大學任教以後，傅斯年在宴請外賓時，經常邀他作陪，並向外賓介紹說錢穆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儼然將錢視為同道。[35]

傅斯年那時欣賞錢穆的原因，與錢在《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立場有關。錢穆寫書的出發點，是反對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說法，即批判所謂「新學偽經」論。而他採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漢書》，將劉向、劉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跡，逐年記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

33 錢穆，《國學概論》，330~331。

34 參見錢穆，〈易經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書局，1980），172。

35 見錢穆的學生誦甘，〈紀念錢師賓四先生〉，《錢穆紀念文集》，45。另見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313。

臺灣大學哲學期刊資料庫

就劉向、劉歆的生卒年來看，劉歆領五經只有大約五個月的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製造「偽經」，顯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為的說法，劉歆造「偽經」是為了幫助王莽篡權，但從時間上來看，也不成立，因為在劉歆爭立古文經時，王莽還不具備篡權的機會。由此看來，錢穆的成功之處，是用歷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來鑒別經書的真偽。錢穆自謂：「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凡近世經生紛紛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實，皆可以返」。而「發古人之真態」，則是他著書的「嚆矢」。[36]這也就是說，他用考訂史實的方法，重建歷史、「再造文明」。難怪胡適、傅斯年會欣賞他了。如果說顧頡剛之提拔錢穆，是欣賞錢的以史證經的方法，那麼傅斯年之欣賞錢穆，則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從「疑古」走向「重建」的關鍵時期。換言之，此時的傅斯年，已經與顧頡剛「分道揚鑣」，不再以懷疑、批判古史為重點，而是想通過科學方法，重建中國的古史了。[37]錢穆雖然沒有運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證史，但他的著作異曲同工，為重建古史做了貢獻。[38]

至於顧頡剛與錢穆，在那個時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其原因也主要是由於研究興趣與方法的相似。在錢穆應顧頡剛之邀，寫作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後，顧頡剛也寫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其中說道：「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穆），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的方

36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1989），6~7。

37 參見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116期（1995，臺北），10~29。另見王汎森，"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第三章；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第四章；以及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8。

38 其實，傅斯年雖然提倡用考古的方法研究古代歷史，但他自己在治學時，仍然以文獻材料為主。如他的〈夷夏東西說〉和〈大東小東說〉，都是例子。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便」。[39]雖然顧頡剛在文章中，採用了康有為「新學偽經」的不少觀點，與錢穆對當時今文經學的不滿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處。他們都以考證的方法，重構古史。在顧頡剛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後，他又請錢穆作評論。錢穆也不諱言，對顧的「疑古」，提出了批評，認為他還未能擺脫今文學家的影響。顧頡剛回應說：「我對於清代的今文家的話，並非無條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們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們的歷史考證」。[40]Jerry Dennerline所言，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填補了顧頡剛1926年開始研究的新史學中的空白」。[41]

顧頡剛對錢穆歷史考證手段的欣賞，在他1929年讀到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初稿時就開始了。從該書的範圍來看，錢穆的寫作顯然受到清末民初學術界對諸子學研究的影響。如王先謙、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和胡適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從錢穆書的結構來看，則又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埒。他們都想將先秦諸子學術的演變，做一系統的整理。不過，胡適對諸子著作的態度，有一種懷疑，認為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錢穆則雖也有疑，卻又自然帶有一種尊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與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區別在於：「余疑《堯典》，疑《易傳》，疑老子出庄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42]這段話十分重要。錢穆等於是在說，雖然他們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卻很不同。正是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錢穆以後的變化。不過在當時，錢穆還沒有全面闡述他的文化、歷史觀點。他還是以「考史」聞名。

但或許是由於兩人研究相近的關係，胡適與錢穆之間總是有一種緊

39 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138~139。該書還提到，錢穆的手稿在顧頡剛遺書中發現，其題目原來是《劉向劉歆王莽年譜》，由顧頡剛改為今題，見頁139。

40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139。

41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9。

42 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1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的關係。雖然在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發表以後，胡適承認錢穆的學問，對人說若要問先秦諸子的事，不用問他，可以問錢穆。[43]但他們兩人初次見面在蘇州，就有點話不投機。胡適與顧頡剛兩人都由於東吳大學教授陳天一的介紹而認識錢穆，但胡適到蘇州中學演講遇到錢穆，雙方都覺得「意見不相得」。[44]錢穆到北京任教以後，又由於顧頡剛的介紹，再次與胡適相見，討論學問，但以後還是往來很少。[45]這裡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見不同；胡適力求改造，而錢穆希圖維護。而在具體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如對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6]二是兩人當時的治學相近，以致「同行相輕」，也有可能。胡適與馮友蘭之間的緊張關係，與他和錢穆的關係，其性質有點類似。[47]

四、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

以上的論述表明，在錢穆1929年進京任教前後，他的學術研究，以「考史」為主，因此與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科學史家」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欣賞。但在學術信仰上，已經表現出某些不同來，只是錢穆還沒有機會具體論述。余英時在評論他老師的學術生涯時說：「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這是非常道地的觀察。對於這一佔據「主流」的學問，據余英時的回憶，錢穆還是頗為欣賞的，認為是一種「客觀的標準」，

43 見錢仲聯，〈紀念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錢穆紀念文集》，78。

44 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錢穆印象》，34~35。

45 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140。

46 胡適對於老子的看法，見其《中國哲學史大綱》。錢穆的有關論文，見《老子辯》（上海：大華書店，1932）。

47 周質平對胡適與馮友蘭之間的關係，有很好的研究，見氏著，〈胡適與馮友蘭〉，《知識分子》夏季號（1991，紐約），78~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只是由於以後戰爭的破壞，才喪失了影響力。[48]所謂「客觀的標準」，也就是說史家在研究中對史料所採取的審慎和批判的態度。這一標準在中國史學界的建立，自然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關。錢穆在史學界地位的建立，也顯然是由於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這一標準。

但是，在錢穆進入中國學術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就已經在不少學者的心上，投下了一個陰影。提倡科學史學最力的傅斯年在當時，也已經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他的具體作法是，通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財力，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實證的考察，希望用考古發掘的事實批駁「疑古」的論調。而對於東北的喪失，他則以寫作《東北史綱》來駁斥日本政府認為東北不屬於中原大陸的說法。由於寫作匆忙，他的《東北史綱》裡面包含不少史實的錯誤，由此引起一些學者的嘲諷，認為他一方面提倡「史學就是史料學」，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49]但該事件說明，當時中國的學界，幾乎沒有人可以對「九一八事變」無動于衷。

錢穆自然也不例外。據他自己說，他之研究歷史，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開始。[50]這裡的意思顯然是，雖然錢穆以前也治史學，但並沒有「著史」，而是「以史證經」、「以史證子」。但自東北淪陷以後，則開始希望通過歷史的敘述，來重振民族的信心。換言之，雖然錢穆以「考史」出名，但他進入史學界以後，則由於時局的關係，逐漸改變了治學的方向，改以「著史」為主了。錢穆的「著史」，包括了教學與著述兩個方面。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如著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國史大綱》。錢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講授歷史的開始。而這個時候，正好是1931年，即

48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文化》，15~16。有關當時史學界考證史學的影響，參見前引拙文，〈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29~39。

49 王汎森對傅斯年之寫作《東北史綱》及其反響有很好的研究，見他的博士論文"Fu 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第五章。另見前引余英時文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century China", 172。

50 見吳沛瀾，〈憶賓四師〉，《錢穆紀念文集》，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他所擔任的課程是「中國上古史」和「先秦史」。但東北淪陷以後，由於民族主義的高揚，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開設「中國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這一課程，但在課程設置的方面，卻有不同的意見。從傅斯年提倡「專題研究」的立場出發，這一「中國通史」的講述，應派幾位專家分別擔任，因此最初北大曾準備由十五位專家承擔這一課程。後來由於實行起來困難，才由錢穆建議，由他和陳寅恪兩人主講。最後，錢穆自告奮勇，決定一人承擔。[51]由此便有了《國史大綱》的寫作。

在如何教授「中國通史」上錢穆與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視為錢穆與「科學史家」分道揚鑣的一個最初的標誌。雖然這裡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個教學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卻反映了史學觀念的不同。從傅斯年的立場出發，現代史學的特徵就是史家對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以求得對某一階段歷史的認知。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開始便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52]而從錢穆講授和寫作「中國通史」的情況來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評的那樣，其中既講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義。難怪從那個時候開始，錢穆與傅斯年的關係就逐漸惡化，以致傅斯年後來對人說，錢穆寫的東西他從來不看。這與錢穆初到京時，傅斯年經常在宴客時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別。[53]

錢穆與傅斯年交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錢穆此時已經開始在治學的興趣與方法上，都有了改變。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錢穆進京以後，他就很少再從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文章以外，錢穆僅在1939年寫過《史記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時間都用在闡述

51 參見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錢穆印象》，37和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9~60。

52 《傅孟真先生集》第4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1951），169~170。

53 誦甘，〈紀念錢師賓四先生〉，《錢穆紀念文集》，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特質等方面。余英時在一篇紀念錢穆的文章中用「一生為故國招魂」為題，概括錢穆的學問重點，可謂十分貼切。[54]這一重點在抗戰開始以後，特別明顯。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見端倪。因此，錢穆的治學方法和興趣的轉變並非突然，而是與當時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北京學術界的風氣息息相關的。

錢穆得以進入北大歷史系，與顧頡剛的推薦有很大的關係。本來北大想請的是顧，而顧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去北大，就安排了錢穆去那兒。顧頡剛是古代史的專家，錢穆替代他，自然也擔任這一方面的課程。[55]他在走上講壇以後，馬上就發現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領域。由於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辨」的爭論，各派立場都有代表，互不相讓。錢穆自己說道：「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教授的講義稿在授課以前就廣為散發，可見聽課的學生很關心教授的立場。[56]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學生的興趣和態度來說，看來是贊同顧頡剛的為多數，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持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辨》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長」。[57]這雖然只是一個例子，可由此可見，當時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主流」歷史學家影響之大。

錢穆在起初的時候，也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據他的另一位學生楊向奎回憶，1931年錢穆到北大教書時，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級，修了錢的「中國古代史」。「按一般規定，中國古代史應當自虞夏商周講起，但錢先生並不如此，他只是根據他的『先秦諸子繫年』的內容，自先秦諸子講起，聯繫史實講下來，一年也沒有出這個範圍」。[58]但錢穆同時也

54 見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19~29。

55 有關顧頡剛推薦錢穆去北大的事情，詳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140~143。錢穆1929年進京時在燕京大學教的是國文。

56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印象》，9。

57 吳沛瀾，〈憶賓四師〉，《錢穆紀念文集》，52~54。

58 楊向奎，〈回憶錢賓四先生〉，《錢穆紀念文集》，3。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在尋求變化。他也許感到那些「主流」歷史學家對傳統的態度過於偏激，不利於中國的民族主義立場，因此試圖盡自己的力量改變風氣。如他在北大開選修課時，就自定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希望對這一時代思想史的發展提出與梁啟超不同的解釋。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依該課的講義為基礎寫成。錢穆的這部著作，體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從當時北京學術界的風氣來看，他之講授「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無異是對清末民初，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術文化主流的一個挑戰。因此錢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開「中國政治制度史」時，歷史系主任、留洋歸來的陳受頤認為中國已進入民國時代，以往的君主專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錢的課上沒有歷史系的學生。反而是法學院院長周炳霖（也是留洋歸來的學者）認為政治系的學生也應知中國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學生來修，才使課得以開成。[59]

雖然錢穆之開「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乎一種政治表態，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並沒有對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自己明確的見解。他只是通過講壇和著述，伸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學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學時，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長處。他在那段時間，與各派人士都有交往，達三、四十人，實踐他的「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的信仰。[60]但是，正如余英時所言，錢穆雖然起初為「主流派」的學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所謂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與胡適等人不太投緣，或觀點相左的人。[61]而錢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賞識，則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立場。雖然這些人接受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但他

59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47~148。另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27。

60 有關錢穆的幾部傳略中都提到錢穆在三十年代交遊之廣，如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314。另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29。

61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和〈錢穆與新儒家〉，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16、57~61。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們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因此，錢穆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對左派學者有參考的價值。[62]從錢穆自己的回憶來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時，交往最為緊密的是湯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3]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顧頡剛，錢穆對顧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戰時期，顧頡剛在成都借齊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希望錢穆任主任，錢遂離開西南聯大，於1940年到成都協助顧。雖然研究所所處的成都賴家園僻處鄉野田間，但錢穆認真講授，培養了嚴耕望、方詩銘等歷史學家。[64]

錢穆之離開西南聯大，自然是由於顧頡剛的邀約，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關。錢穆自述：「自余離開聯大以後，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65]這種情形，雖然發生在錢穆離開聯大以後，但可以想見，在他未離開以前，也已經有了不少反對者。錢穆當時的反應就是，潛心寫作《國史大綱》，全面闡述他對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閱讀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國史大綱》以後，又花一年多的時間自學英文，以求能讀原著。[66]到抗戰結束以後，錢穆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已經不時摻雜他對西方哲人的評論，可見他對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也下過一定功夫。[67]

---

62 有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民族主義，可參見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拙文，"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1949-196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3*(2000), 95~111，對此也有分析。

6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55~56。

64 參見嚴耕望的回憶〈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印象》，13；方詩銘的〈錢賓四先生散憶〉，《錢穆紀念文集》，37~39。

65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232~233。

66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9。

67見諸宗海在〈國魂常在、師道永存：為紀念賓四先生逝世一周年寫〉中回憶道：錢穆在抗戰以後，與學生交談時，「於儒家學說、釋道思想，俱有闡發，對康德、尼采、柏格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室藏

余英時指出，「錢先生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68]換言之，從那時開始，他已經決定公開向西化的思潮反擊了。錢穆自己也說，寫作《國史大綱》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改變。「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69]而《國史大綱》則是他表明立場，確定學問宗主的開始。錢穆在發表《國史大綱》（1940）以前，決定將其〈引論〉首先在報紙上發表，反映了他在那時的急切心情。如果寫作《國史大綱》是為了褒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那麼他的〈引論〉就是這一立場的公開宣言。

有關錢穆《國史大綱》中的歷史觀點，已有不少論述，筆者也另有專文。[70]此處僅想以《國史大綱》〈引論〉為主，分析一下該書在錢穆學術生涯中的含義。錢穆寫作《國史大綱》所公開的立場，可以見於兩個方面。第一有關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第二有關當時史學界的流派。他在〈引論〉中開宗明義，從中國的歷史著眼，正面肯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地位，反擊「西化」論者貶低本族文化的論點。錢穆說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錢穆這裡所謂的「歷史」，有歷史與史學兩個意義。「悠久」指歷史，而「無間斷」與「詳密」指中國的史學傳統。錢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71]錢穆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十分鮮明。

森、黑格爾，各有評論」。見《錢穆紀念文集》，66。

68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40。

69引自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錢穆印象》，43。

70有關的專題論文很多，這裡僅舉幾例。楊承業，〈讀「國史大綱」與「國史新論」感言：道統與法統獻論〉，《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379~420；何茲全，〈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讀《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札記〉，《錢穆印象》，138~162。拙文，〈儒學與史學：錢穆《國史大綱》中之歷史觀分析〉，發表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9年7月的「儒學與現代東亞」學術討論會。

71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商務印書館，1995），上冊，〈引論〉，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既然歷史與史學是錢穆立論的主要根據，他就必然要闡明他的歷史觀與史學觀。在他看來，史學包含「歷史材料」與「歷史智識」兩種。「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72]換言之，「歷史智識」是一種歷史的解釋，反映了現代人對過去的認知。這種認知必須不斷更新。由此可見，錢穆的史學觀反映了一種現代的歷史意識，與以往史家單純記述歷史的作法有重大區別。[73]如果用錢穆的話來說，即他認為現代史學家不應像「傳統派」的史家那樣，「主於記誦」，而須溫故知新。除了「傳統派」以外，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史學界還有兩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學派」。他對「科學派」所下的定義十分明白，認為它「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代表，顯然指的是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史學。但在錢穆眼裡，這一學派並無什麼價值。下面請看他的評語：

> 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74]

這一評語，十分尖銳，其矛頭與其說是指向胡適，無寧說是指向傅斯年，因為胡適尚有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傅斯年反對「著史」，以專題研究為重，又崇尚實證、客觀之史學，與錢穆所言更為相合。[75]顯然，

72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引論〉，2。

73 有關現代歷史意識在中國的產生，筆者在〈中國二十世紀史學與西方：論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中有所論述。《新史學》9卷1期（1998，臺北），55~84。

74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3~4。

75 這一治史之傳統在現今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近史所，仍然流行。其研究人員昇等，仍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稱他從來不讀錢穆的書，錢穆對傅也無多少好感可言了。在錢穆的回憶錄中，他還試圖將顧頡剛與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區別，認為他自己與顧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學的德國蘭克學派），則似尚有迥異於此者」。[76]

錢穆比較欣賞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從他的解釋來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來章太炎、梁啟超等提倡的民族主義史學。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時，將錢穆列於其中，頗有道理。[77]但是，錢穆對章、梁等人的民族主義史學，也有批評，認為他們對傳統文化，批評太多，而於西方文化，過多贊揚。因此也有必要修正。[78]毋庸贅言，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是這一修正工作的開始。除了該書以外，他在當時和以後的論著中，都對中國文化的傳統，從歷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紹與肯定。[79]

由此看來，錢穆《國史大綱》的寫作，是他公開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決裂的一個重要標誌。該書的出版，表明錢穆已經不再以「考史」為治學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揚中國文化、強調中國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為己任。自此以後，一直未有改變。據許多人回憶，1986年錢穆在臺北「素書樓」的最後一課，以「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為結束，可見他直到晚年，始終沒有放棄、動搖過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仰。[80]錢穆如此公開地批評胡適、傅斯年，那麼對方也有反應。1945年抗戰結束

以在該所集刊上的論文為重。

76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46。另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27。

77 見前引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century China一文。另見余英時的解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文化》，17~18。

78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4~6。

79 錢穆於1941年在《教育雜誌》的「歷史教育特輯」上與陳立夫、黎東方、繆鳳林等人一起發表的、題為〈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的文章，就是一例。《教育雜誌》31：11（1941，重慶），20~23。而在他的晚年，更有多部從史學的觀點「為故國招魂」的著作，如《中國歷史精神》、《中國史學發微》等。其觀點、內容，與《國史大綱》相近。

80 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以後，傅斯年代胡適任北大校長，就沒有聘請錢穆回北大任教。當時未受到聘書的原北大教員，大都是因為在抗戰期間與日本有所妥協而致，而錢穆沒有此等「污蹟」，可見他與傅斯年學術上的分歧，是他未獲聘書的主要原因。錢穆在1949年以後，沒有馬上到臺灣，而是在香港創立新亞學院，也說明錢穆在那個時候，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81]

五、結論

綜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錢穆的學術生涯，如果從他與「科學史學」的關係來看，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時期，那時錢穆治學的特點是，逐漸走出傳統，與新學問接觸並有所靠攏，試圖用考證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學問。這使他的著述，得到科學史家的讚賞，成為當時「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還是與胡適等人有區別。1931年錢穆到北大任教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他逐漸與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響的人物分離，而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強調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價值。他一人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和用正面的角度評價清代的學術文化，是他與科學史學的人物逐漸疏遠的標誌。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則表明他已經公開與科學史學的人物決裂了。不過在那時，以胡適、傅斯年等人為首的「科學史學」的地位，也已經大不如前了。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勃興，使得人們對那種單純以考訂史實為主的科學史學，興趣頓減。而對緊密聯繫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增加了興趣。錢穆所代表的則是在這兩派之外的另一種取徑，雖然未能像馬克思主義史學那樣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但其影響十分深長久遠，而在近年非但在港臺，而且在中國大

81 錢穆與傅斯年還見過一次面，那是在1950年，錢已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為了獲得國民黨政府的援助，錢到了臺灣。那時的行政院長陳誠設宴招待，由傅斯年作陪，兩人大談乾嘉學派。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281。

臺灣大學哲學系

陸，都有擴大之勢。從這一趨勢來看，傳統文化對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吸引力，雖經多次「革命」，終未能改變。

在結束本文以前，筆者還想做一點說明。此文以探討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間的關係為重點，因此便有將兩者硬性對立起來的嫌疑。但這並非筆者的真意。事實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歷史現象之間的複雜性，特別是錢穆學問中的多面性。而中國現代史學的變化，更是型態多樣。現代中國的歷史起伏動蕩，置身其中的知識分子不免發生變化。梁啟超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82]而1937年抗戰的爆發，更使得不少人為了民族大義，重新為自己的學術定位。即使是這裡作為錢穆之「對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顯的變化。因此以上對史學界各種流派的劃分，只是一種「暫時的」(temporal)作法。歷史的持續與變化，特別是其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的分化組合，向來是歷史研究的主要的吸引力，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主要動機。

*筆者感謝臺灣大學中文系的邀請，在「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此文，也感謝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先生的評論和《臺大歷史學報》兩位審稿人的意見。

（責任編輯：林志宏　校對：張繼瑩）

82 本文中將梁啟超視為「科學史學」的代表，但梁在二十年代，已經對中國的傳統史學有了不同的看法。詳見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103~11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Qian Mu and Scientific History

1926~1950

Q. Edward Wang
History Department, Rowan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writings in 20th century China witnessed several major changes. These changes caused historians to form different school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instance, there appeared three schools: the scientists, the traditionalists, and the Marxists. Or,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e found the antithesis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School" and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School." There were also a great deal of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schools. Focusing on the early career of Qian Mu, this article examines Qian's association with the scientific historians, or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School."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during the 1920s and the early 1930s, Qian basically adopted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pplying textual criticism to historical sources. It was largely due to the increasing threat of Japan's invasion in China in the late 1930s that he began to embark on a different career path,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and well known for its emphasis on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Keywords: Qian Mu, Scientific history, Hu Shi, Gu Jiegang, and Fu Sini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